

●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齐鹏飞 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 当代中国外交 (1949-2009)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DANGDAIZHONGGUO
WAIJIAO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与 当代中国外交

(1949—2009)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DANGDAIZHONGGUO WAIJIAO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齐鹏飞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8-0589-3
I. 中… II. 齐… III. 外交—研究—中国—现代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4171 号

书名: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

主 编:齐鹏飞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9mm×239mm 1/16
字 数:343 千字
印 张:25.7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589-3
定 价:45.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杨凤城 王顺生 齐鹏飞 主编

丛 书 序 言

2002年年底教育部批准的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之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目前的这套丛书即是这一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所以言其新，是因大致上说来它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新世纪到来后的事情。学术发展学术流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变迁，或者说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动魄令世人瞠目的重大变革和戏剧性变化。其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澎湃的欢乐乐章，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更有峰回路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惟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这一切不值得从执政的角度加以总结与反思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令人目不暇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等全新的问题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形成挑战。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进展，中国

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弊端不断被革除的同时,新的问题相伴而生,而且它们不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同时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了,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业问题、腐败问题,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等等。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开拓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但是亦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基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价值日益凸现出来,它先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点题”,继之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响应和讨论,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形成时间短,但其成果就其“短时段”而言却不可谓少,甚至可谓丰富。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大有连篇累牍欲罢不能之势,大家欲在这一新领域有所建树的决心昭然。检视该方面的研究,成就不言而喻,新的领域必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论说内容,它们或者是过去不曾有的,或者是过去没有充分展开的。但是,问题或者缺陷亦明显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深度欠缺,学术含量不够。学术研究应做到“走得进”、“出得来”。所谓走得进,就是要深入材料中,对研究对象有一种深度的身临其境的理解;所谓出得来,就是要能够从材料中跳出来,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站在学术高度和立场上进行客观审视。在这方面,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努力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不够。一些观点和结论显得空泛甚至随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即研究者的结论看上去十分正确,然而你会觉得这种十分正确的结论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就能得出,甚至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也能总结出几条同样正确的结论。这样的研究自然缺乏厚重感、历史感。当然,必须马上指出的是,上述缺陷对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指出上述缺陷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能够完全克服或者避免这些缺陷。这需要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而努力的开始便是对这些缺陷的自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力求做到客观深入,力求做到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具体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问题意识与总体梳理相结合,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上,在吸收已有中共历史和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建树有所突破。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设计的这套丛书包括六本著作,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

目标设定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往往会产生距离,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或者接近设定的目标,只有等待专家和学者的评判与批评了。这套丛书的总体设计和组稿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的杨凤城教授、王顺生教授、齐鹏飞教授负责。借此机会,也特别向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审稿者和责任编辑致谢,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对丛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杨凤城 记于世纪城

2007年9月17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凯歌行进的六十年”

-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历史发展大势 /16
- 一、新中国外交史的“前三十年”(1949—1978)：“和平共处”外交 /16
- 二、新中国外交史的“后三十年”(1979—2009)：“和平发展”外交 /31

第二章 自倡导“和平共处”至建设“和谐世界”

-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战略思想的历史演变 /64
- 一、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前夕对于新中国“和平外交”之战略思想和政策的设计 /64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及其外交实践 /67
- 三、新时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和平外交” /76
- 四、“和而不同”: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90
- 五、“和谐世界”新理念 /97
- 六、历史经验与启示 /104

第三章 “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伙伴关系模式”

-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大国外交 /108
- 一、“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当代中国大国外交模式的嬗变 /108

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125
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苏(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162
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207
五、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印外交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220

第四章 构建对外关系的战略性支点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与发展中国家外交	/252
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253
二、国际合作的典范:中非关系的友好发展	/259
三、推进南南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的中拉关系	/270
四、历史经验与启示	/278

第五章 “以邻为伴,与邻为善”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与周边国家关系	/283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中国“以邻为伴,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外交政策及其实践	/284
二、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和平发展,谋求互利共赢”的睦邻外交政策及其实践	/294
三、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以邻为伴,友好合作”的睦邻外交政策及其实践	/301
四、新世纪新中国“与邻为善,构建和谐周边”的睦邻外交政策及其实践	/307
五、历史经验与启示	/313

第六章 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多边外交	/325
一、1949—1970年间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325
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及多边外交活动的逐步展开	/329

- 三、20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及多边外交领域的拓宽 /332
四、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多边外交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特点 /336
五、历史经验与启示 /347

第七章 “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共产党导引的当代中国和平外交之政党外交 /352
一、20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初步开展和
曲折 /352
二、20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于政党外交理论的战略
思考及其特色 /361
三、20世纪 80 年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调整 /367
四、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谐”政党外交的探索与建设 /373
五、历史经验与启示 /388

主要参考书目 /395

导　　言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逢“五”、逢“十”，乃中共党史学界、当代中国史学界习惯称谓之“大年”，都要阶段性地“瞻前顾后”，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况且“六十而耳顺”，好的话、坏的话，都可以听得进去了，可以相对自信而从容、冷静而客观地对自己走过的路、对自己积累的沉甸甸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进行一番审视，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以为前行之思想营养和借鉴。大一点，就“通史”类而言，对6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如此，对6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如此；小一点，就“专题”类而言，对于60年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对于60年的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

新中国外交，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当代中国外交，其历史起点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此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革命运动之对外关系全面提升、全面转型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府外交、国家外交来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外交和社会主义外交，与旧中国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外交相比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执政和“人民当家作主”，由于国体、政体的“颠覆”，其宗旨、其性质、其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独立自主外交”，就是“人民

外交”，就是“和平外交”，就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共同发展，就是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这一切，一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①一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我们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首先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要求。”“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来往。”“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②一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③这一切，一如“开国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论：“中华人民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②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①一如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②一如新中国现行的国家根本大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③新中国外交的60年,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根据对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之认识和判断,在不断调整新中国外交之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但是其宗旨、其性质、其功能则始终没有变。

新中国外交的60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导引的新中国外交之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受制约于并直接反映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对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之认识和判断,直接受制约于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54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2004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并直接反映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和国家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的发展和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全面对立的“冷战”时代,在“一穷二白”的“人口大国”时代,“意识形态挂帅”,“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新中国外交“没有选择的历史选择”;同样,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后冷战”时代,在最具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时代,“以国家利益为重”,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双管齐下”,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与周边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四足鼎立”,政府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甚至“领袖外交”互为补充,全方位地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是新中国外交“没有选择的历史选择”。

经过 60 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新中国外交自“弱”至“强”、自“乱”至“治”,一路风雨过来,终成今日已经是为建设一个内为“和谐社会”、外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新局面,终成今日已经是“负责任的建设者”的大国身份活跃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新局面。今日的新中国,“朋友遍天下”,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当年——1949 年的近 10 个建交国发展到 2009 年的近 170 个建交国,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都有了中国发出的声音。

60 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那番“政治预言”式的宣告已经成为了真真切切的现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今天,一个面向现代

^①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 年 9 月 2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二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对于当代中国外交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规律、特征、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开始于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于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而立”之年。是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包括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第一次进行了一个“瞻前顾后”式的梳理和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三十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他指出，在这 30 年，新中国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开辟了我国外交史的新纪元。我们和友好国家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七十年代以来，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局面，推动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现在，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他指出，在这 30 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 年，新中国

外交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我们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斗争；坚决支持东盟各国捍卫国家独立、维护东南亚和平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各国民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民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配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①

两年以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次集中执政党全党的智慧，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二年”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包括在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又进行了一个“瞻前顾后”式的梳理和阐释：“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指出：在这32年，新中国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①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199页、第214—215页。

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决议”指出:在这 32 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 年,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是:“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①

在 2008 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创 30 周年和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来临之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对于当代中国外交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规律、特征、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又进入到了新的高潮期。200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后三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即新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30 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一个“瞻前顾后”式的梳理和阐释:“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报告”指出:在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43—746 页、第 785—789 页。